

稼贤村不应是一个处于人口危机中的村庄。作为湖南省凤凰县山江镇最大的苗族村子,它拥有3个寨子和1000多人。

然而危机是显而易见的:假如不幸有人去世,人们得到别的寨子求助,才能凑齐几个有力气的人,把逝者抬出门去。

与逐年增长的人口不相称的是这里安静得冷清的氛围。村民们在零零星星的犬吠中入睡,又在此起彼伏的鸡鸣中醒来。整个白天都听不到吵嚷的声息,也不会有人高声喧哗。

上一个夏天,村里发生了孩子被藏在草丛里的蛇咬伤的事情。随处可见的闲置房屋潜伏着威胁:空房的外墙生了苔藓,坪坝长了杂草。稼贤村正在荒芜下去。

放眼全村也难找一个20岁的青年。30岁和40岁同样如此。这个年龄段的人并非不存在,而是已经离开。当了20多年村支书的龙求子说,大概从世纪之初开始,有力气的人陆续到外地打工。至少有半数村民不在家。有些人多年没有回来过。

十年以前,保护村庄的治安联防队由30岁的壮小伙组成。今天的50多名队员均在50岁上下,有些已经抱上了孙子。

看家护院的责任,落到了犬类身上。很难说是从哪一天起,稼贤村里的狗多了起来。它们简直像是一夜之间来到这里的。

狗的数量与出外谋生的村民人数都在上升。原本兴旺的牛和猪的种群则衰落了——再也没有足够的人力像从前那样饲养大的家畜。

稼贤村小学校长龙汉涛估计,全村如今兴许有两三百条狗,以至于去家访的路上,他会顺手捡起一根打狗的棒子。从前,狗是屈指可数的。

然而在这个距离北京天安门约两千公里、躲在崎岖山路深处的苗寨,没有什么明显的威胁要靠养狗防御。农民下地干活也只在门闩上横插一根木条,一些人家连围墙和大门都没有。

稼贤村是一个几乎不存在威胁的地方:这里的人要么还没长大,要么已经老了。

一位阿婆在家里杀猪那天为难地对邻居们说,不是我舍不得煮熟了猪肉分给你们尝尝,我年纪大了,背不动那么多柴火来煮肉了。

外出者把自己扔在了异乡,也把家乡扔到了一个缺乏生机的地方。连肩负重任的狗都提不起精神。见到外人时,它们呆呆的,耷拉着耳朵一声不吭。通常只有晚间才会听到狗叫——那声音只会使寨子显得更加安静。晚上八九点钟,稼贤村就进入睡眠。人们关上木板做的门窗,屋里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。

大多数孩子与祖父母一起生活。冬季,村里的小孩整天吸溜着鼻涕。不过在祖父母看来,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“流鼻涕说明抵抗力强,不会感冒。”

当流行性感病毒进了家门,大的孩子就有责任跑出门



稼贤村的孩子大多数与祖父母一起生活

稼贤村没有二十岁



■ 张国

自2月14日开始,《中国青年报》在头版上推出“走基层·关注留守儿童”系列报道文章,5800万留守儿童再度引发广泛关注。一位参与上述系列报道的记者为本报发来专稿,为我们讲述他目睹“留守村庄”的真实生存状态。

留守少年:学会自己长大



去,给全家人买药。

小学的课程从上午十点二十分开始。早晨,学生们帮着老人放牛、采猪草或是干点别的活计,之后再去看书。

“假如明天下雨”,二年级语文课上,老师教学生用“假如……就……”造句。最先完成的孩子说,“我就不去放牛”;另一个答案是,“我就去采蘑菇”。

小学生们会顺手用刚刚砍过柴的镰刀削起铅笔。在稼贤村,四五岁学会放牛、十多岁帮着犁田不是稀罕事。但与上一代人相比,他们的这些本领往往不是来自父母。

龙汉涛观察到,父母不在身边,孩子们的确很早就具备了生活技能,可是,皱着眉头心事重重的孩子也多了。

8岁女孩龙群丰一次能吃两

大碗饭。她甜笑着,露出两颗门牙之间的牙缝,轻声说自己想念苹果、山楂还有西瓜的酸甜。家里火塘上终年挂着的腊肉架是空的。只有“过季节”的日子,多数村民才舍得买肉。有些人家冬季吃的桔子,是从很远的果园捡来的。

群丰家的几个孩子看上去确实是饿极了。他们抱着成人的大碗,好像随时能把饭扒进嘴里。没到开饭的时刻,就会从锅里铲一碗剩饭,飞快地把米粒吃到脸上和鼻子里。他们的衣服经常挂着口子。

令老师担心的是,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,祖孙关系日渐复杂。

山江镇中心完全小学教师隆茂昌的侄子与年过七旬的祖母一起生活。去年,因为祖母拒

绝多给零用钱,孙子举起凳子扔了过去,砸坏了门窗。全家人对此心有余悸。

高年级的女孩向这位老师诉苦,“在屋里只有我一个人,什么都要自己做——做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做”。

“他们必须学着靠自己长大。”隆茂昌难过地说,他们学会煮饭、洗衣,学会很多事情,但那是情非得已的。

镇上的中学老师吴建辉听到学生这样向回家的父母赌气:“你打工回来才知道我已经长大。”

在稼贤村,从外面赚了钱的人,回家扒掉灰瓦黄墙的土房,盖起了红瓦白墙的楼房。不过,很多新房空荡荡的。主人修完房子又走了,“去找装修的钱”。

过去,全村人守着967亩水

田和180亩旱地抱怨人多地少。如今,一些地开始荒了。

烤烟一度是家家户户都要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。如今只余三五户还没放弃这项重体力劳动。这个“优势经济项目”的颓势不可避免。在人们离开村子的路上,烟草公司不得不拉起横幅游说他们:“出门打工事事难,不如回家种烤烟。”

从稼贤村出发,要走15公里的山路来到镇上,再乘摇晃的中巴车进入20公里外的县城,从那里奔向更大的城市。这条路上,房产商用“进城梦”一类的吉利话鼓励农民要积极参加到全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中。

横在路上的一条广告语是这样说的:“让自己的小宝宝成为地地道道的城里人。”

地球上已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。稼贤村的代课老师龙汉涛属于另一半。如果不是80岁的父亲和两个不满五岁的儿子拖了他的后腿,他也有离开的打算。这位“教书的农民、种地的先生”月收入725元,比外出打工者要低得多。

十多年前开始,龙老师就利用学校的假期到外面打工。他去广西安装过电线,也去县城加入过盖房子的“铲子队”。

他从内心不想离开稼贤村。可他说,没有钱就照顾不好后代,只能忍痛割爱,出门“找钱”。“归根到底是钱惹的祸。”他认为,有所得必有所失,“一般老百姓两者很难兼顾”。

村里人承认,打工者带回的人民币让稼贤村的经济生活变好了。但这个村子从前热气腾腾的日子算是一去不返了。

苗家的舞狮子、打花鼓,还有那被誉为“穿在身上的百科全书”的苗家服饰,渐渐远离了这些传说中蚩尤的后人。人们隔山相望,对唱苗歌的场景难得一见了。在坡上干活时,龙汉涛听到的,“都是鸟叫和风呼呼的声音”。

村里的篮球架已经不知去向。很难想象多年前这里办过篮球赛。昔日的篮球队长慢吞吞地概括:“我们这儿的小孩,出生在这里很吃亏。”

以前,孩子们吃亏在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。如今,大人感到亏欠的是,孩子长得高过了母亲,而母亲却是最后发现的那个人。

村里的14岁少年龙智星说不出自己的理想。在浙江打工的父母早就告诫他好好读书,别再像他们一样出卖苦力。他学习不错,有望跳出山村,考取大学。在当地人看来,假如学业不佳,他有可能进入多数村民的循环轨道:在最好的年华外出谋生,年迈之后重回故里,变成祖父,照看儿孙,“就是这样下去”。

无论走上哪一条道路,20岁生日那天,龙智星呼吸的很可能并不是稼贤村的空气。沉默的稼贤村存在一个空白地带:这里有两岁,有80岁,就是不存在20岁。

(作者系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)